



思想者自述文丛



两度人生

——刘再复自述

刘再复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非外借

思想者自述文丛

两度人生

刘再复自述

刘再复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度人生:刘再复自述/刘再复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11

(思想者自述文丛/柳鸣九主编)

ISBN 978-7-5559-0414-4

I.①两… II.①刘… III.①刘再复-自传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8576 号

(本书内容由吴小攀编选)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62 000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2011.6.22
Aurora

“思想者自述文丛”代总序

院落的较深处，圆锥形的柏树簇拥着一块大理石的基座，上面坐着那个著名的思想者。他全身赤裸，一手放在膝上，一手托着下巴支在腿上，牙齿使劲地顶着他自己的手，全身的肌肉则紧张隆起，似乎在进行一种强度极大的体力劳动。他是一个在思考某个永恒问题的智者？或者就是思考着一切问题，永远也不能从沉思中解脱出来的人类的缩影？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人类进行思考探索，从事精神劳动的崇高与艰辛，不是都完美地、强烈地体现在这苦思冥想的形象中，体现在这既强有力又毫无遮盖与庇护，因而最易于招致伤害的身姿上吗？谁要是为了探索与研究，为了思考与创作而曾竭其心智，而曾度过不眠的夜晚，而曾两鬓添上了秋霜，而曾尝过辛酸与苦涩，一来到这赤身裸体经受着日晒夜露、风吹雨打的形象面前，怎么会不百感交集、怆然而涕下？

——柳鸣九：《在“思想者”的庭院里》

目 录

关于两次人生的答问 刘再复 吴小攀 -----001

 读书时代 -----001

 社科院岁月 -----004

 去国怀乡 -----011

 归国之路 -----015

 婚姻家庭 -----018

 学术研究 -----020

 散文创作 -----023

 文化批判 -----025

 读书经验 -----027

 师友纪事 -----029

 历史人物评鹭 -----037

 “忏悔意识” -----041

 关于当下世事 -----044

 关于第一人生与第二人生 -----046

 关于祖国 -----049

 关于知识 -----052

 关于政治 -----053

 关于理想社会 -----055

 关于近代史 -----057

关于革命与启蒙	059
关于宗教	064
关于文学	067
关于哲学思维	072
关于后现代主义	075
警惕文化变形变质	077
关于禅宗文化	079
关于回归童心	084
渐进式文化更新	086
 走向人生深处 刘再复 吴小攀	 089
第一人生与第二人生概说	089
两次人生不同的人生观	091
 我的写作史	 098
写作的五个维度	098
“我注鲁迅”和“鲁迅注我”的幼稚开端	099
人性真实的第一次呼唤	109
“主体飞扬与超越”引发的论争	115
为了现实对话的传统批判	120
走出共犯结构和中西文学的宏观比较	122
第二人生的自救性写作	125
《告别革命》两边不讨好	139
返回古典与梦醉红楼	147
两座地狱之门的发现	153
守护个性“五四”和拒绝孔子还乡	157
人性真实的第二次呼唤	162

历史长河中的 15 种思想颗粒	165
最后的觉悟:无目的写作	174
刘再复“自述”文选	178
学术自述	178
第三旅程告示	181
回望 80 年代	183
上海,助我思想飞扬的上海	197
刘再复简明年谱 刘锋杰 李春红	204
刘再复著作出版图表 叶鸿基整理	232
后记	239

关于两次人生的答问

刘再复 吴小攀

读书时代

吴小攀：您是福建人？

刘再复：是，福建南安县刘林乡人。我实际上是农家子，7岁的时候父亲去世，留下我和两个弟弟，最小的弟弟刚生下两个月，所以家境很苦。我妈妈从27岁开始守寡，到现在已经五十几年了，这期间没有其他情爱的故事。我写过一篇散文《最后的道德痴人》，“痴情”的“痴”，最后的一个道德痴人，21世纪不会有这种人了。

父亲去世那个瞬间，我就马上严肃起来，觉得自己有责任了。需要照顾两个很小的弟弟。我从小失去父亲，从小体验孤独与贫穷，不过，人生当中最深刻的体验是饥饿的体验，1960年前后是困难时期，在厦门大学，天天都觉得饿，还得了水肿病。大学毕业以后到山东劳动锻炼一年，那一段也很苦。

吴小攀：您当时读的是中文系。

刘再复：是。其实读外文系、哲学系、历史系更好，不一定要读中文系，中文可以自学的。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大学毕业以后的自学能力，自学是关键。在校园里学习的时间有限，重要的是离开校园以后的自学。心灵的生长，智慧的生长，是长期的，得靠大学毕业后的漫长时间。我很注意培养这种自学能力、感悟能力、认知能力。读书才有知识，但要穿透知识，感悟知识，提升知识，这套能力如果强，每一天都会进步。

吴小攀:这种严肃、学习的态度从7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

刘再复:7岁的时候本来应该好好玩,可是因为父亲突然去世了,两个弟弟那么小,于是在朦胧中意识到一种责任。大家都说,你应该好好读书,你责任很大。那个时候我们家乡还没有解放,学校规定,第一名才可免费,所以我一定要读第一名,第二名没用。当时有两个华侨女孩子和我争,期中考我输给她们,到期末我又赢她们了。

吴小攀:更具体的家庭境况是怎样的?

刘再复:我的童年尤其是少年时期,一直处于极端的贫穷之中。母亲和我们三兄弟在父亲去世后即从厦门搬到我父亲的故家南安县刘林乡高山村,我随后进入高山小学。那时我父亲名下只有一两亩地,母亲不会干农活,只能租给人家。但她是非常要强的人,东讨西借还变卖自己的一些衣服首饰(我外祖父是印尼华侨,母亲嫁到刘家时带来的),竟然撑了好几年。

我的二伯是马来西亚的华侨,但是支持不了我们,倒是外祖父在世时,因舅舅每月给他一点生活费,他会拿一两块钱给我妈。我母亲到镇里去买过连环画和普希金童话诗集给我,用的就是这点钱。见到连环画时我高兴得大喊大叫。撑了四五年后,母亲撑不住了。为了让我上中学,也为了全家能活下去,她竟然把我的三弟卖给同乡的一位菲律宾华侨,卖价450元。此事对我刺激极大,当然也刺激我更发奋读书。我读小学六年,创造了六年全是每天第一个到校的纪录,常常到校时,住校的老师还没有吃饭。

我母亲在泉州培英中学读完初中后就嫁给我父亲,守寡的生活太苦,一心就想让我出人头地,为她争气,这确实也成了我少年时代读书的巨大动力。虽然初中、高中、大学期间,我都有学校给的助学金(初中每月3元,高中每月5元,大学每月13元),但如果没有母亲,我还是活不下来。

吴小攀:您母亲一直和您住在一起吗?

刘再复:我到北京工作时,母亲还是留在家乡,1967年我结婚后她到闽西连城一中和我爱人陈菲亚住在一起,并照看我的大女儿剑梅。自从剑梅诞生之后,她几乎把全部情感投向她,和对待我的童年一样,对剑梅同样出奇地严格。她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一边烧火,一边看着孙女读书。

吴小攀：您是在福建南安国光中学念的书？

刘再复：初中在成功中学，高中在国光中学。国光中学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写过一篇《永恒的纪念碑》，感谢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先生创办了国光中学。有两样对我有帮助，一个是学校有很多侨生，我们班一半是侨生，这些侨生来自东南亚各地，他们有很多信息、很多看法，在他们那里，我的眼界被打开；第二是图书刊物很多，这在全省少有，再加上礼拜六礼拜天都有电影，很多外国名著，像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第十二夜》，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意大利的《偷自行车的人》，埃及的《爱的权利》，等等，根据这些名著拍成的电影，我都看了。还有那么多书，像《莎士比亚全集》，托尔斯泰的名著，全都读了。

吴小攀：小时候虽然不一定看得懂，但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内在的。

刘再复：读莎士比亚，爱到什么地步呢？阅读时害怕看完，看了十几部剧本以后就害怕看完，太精彩了，看完以后怎么办？所以，到了大学就有了底子，郑朝宗老师教西洋文学史，那时候我们那个大班有200个人，分四个小班，西洋文学史得5分的有两个，我是其中一个，他很满意。考莎士比亚，我可以把哈姆雷特的很多话背下来，郑老师高兴得在考卷上题诗。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来脱帽了。他是钱锺书先生最好的朋友，去世了。他散文写得很好。

吴小攀：描述一下您年轻时候的样子？喜欢什么运动？

刘再复：年轻时我比较瘦弱，1963年大学毕业时体重仅86斤，到山东去锻炼一年后，体重身高都增长了许多。我不喜欢参加体育运动，但喜欢观赏体育运动，而且崇拜出色的运动员。读初中（福建南安成功中学）的时候，母校的首席运动员、百米赛跑的冠军戴耀星，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名字。100米他仅用10秒多就跑完了，可是我得用20秒。我跑步的速度比同班的女同学还慢，因此非常崇拜戴耀星，他比我高两个年级。晚自习时，我常常拿着书本与作业本到他的座位边上用功，休息时可以和他说几句话。他也把我当小弟弟似的。我唯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那是读高中时，在国光中学当老师的舅舅叶重青教我的。

吴小攀:在大学里,谁对您影响最大?

刘再复:除了郑朝宗老师外,还有彭柏山老师。他是上海市的第一任宣传部长,原是左翼作家,后被打成“胡风分子”,因为叶飞、皮定均两位将军的关系,他被保护到厦门大学,成了我的写作实习课老师。他对学生既慈悲,又严格。我的作文本被他批改得密密麻麻。

社科院岁月

吴小攀:大学毕业后,您怎么会分配到中国社科院的?有什么特殊的人事起了作用吗?

刘再复:没有任何人际关系。我是1963年的校级优秀毕业生,全校只有六个。他们(北京)派人来选拔的。

吴小攀:知道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时,感觉如何?对自己的未来有何规划?

刘再复:很高兴。但没有什么规划。我知道,此处学者成堆成群,这一集体的大气场对我的学术有益,但恐怕不是文学创作的好地方。

吴小攀:到了工作岗位一段时间后,这种感觉和规划有变化吗?

刘再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感到知识分子也很野蛮,尤其是小知识分子。还感到,学术权威们也很脆弱,拥有坚定信念的名家很少。

吴小攀:“文革”期间,您在哪里?在做什么?

刘再复:“文革”时期,我一直在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作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也随社会科学院南北辗转,包括到河南息县、明港等处的五七干校(从1970年至1973年)。具体的单位是《新建设》编辑部。下干校之前(1966年之后的五年),我“丧魂失魄”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不断地读大字报,写大字报,不断地批判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从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到批判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前领导人,不知浪费了多少笔墨,写了多少荒唐的文字。那时,整个国家变成疯人院,我也跟着发疯。

吴小攀:有什么需要忏悔的吗?

刘再复:最让自己不安和忏悔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几天,我受《新建设》党支部的指令,到文学所参加批判何其芳的会,还读了一篇批判何其芳人性论的稿子。因为何其芳是我热爱的诗人,人性论又是我内心认同的思想,批判他完全违背自己的本性。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1975年我筹办《思想战线》向他约稿时向他道歉,他却竭力安慰我。

还有一件事是,我在《新建设》中是属于反对极左的少数派里仅有的五个人之一,结果给整治了一个月,被批得灰溜溜,我作了检查过关后,对立派让我到他们的“大批判组”写文章批刘少奇,没想到我一写就被登上《人民日报》(用的是写作组的名),题目叫作《埋葬中国赫鲁晓夫的驯服工具论》,尽管当时人人都在批判刘少奇,但我却写得如此“出色”,这笔账是赖不掉的。

吴小攀: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刘再复:当时的社会科学院显然是个“革命重镇”,我又偏偏住院部的单身汉楼里(后来被朋友取笑是社科院的小地保),因此各个研究所的重点“黑帮”揪来批斗时我都去“观赏”,虽然只是观众,但常常吓得魂不附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太多,足以写一本书,今天只能告诉你几件一提就想说的事:(1)全院自杀和被斗死、被打死的有30人左右,其中有几个同龄人,竟然相继自杀,有的割脉管,有的撞火车,有的吊死在暖气管上,还有人被活活打死。文学所的陈翔鹤先生,“沉钟社”的老诗人,就在批斗他的时刻倒地而亡,他的死亡让我永远难忘。(2)文学所批斗俞平伯先生时,开始是给他戴上高帽,后来有位研究人员竟然跑到厕所里把装脏纸的纸篓拿出来给他戴到头上。(3)批斗张闻天的时候(张闻天因庐山会议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后,被免去外交部的职务,到经济所当研究员),经济所的革命派要他承认“一贯反对毛主席”,张闻天说:“我不是一贯反对,遵义会议时我就支持毛主席。”结果是一片“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的呼喊,随后他的头被按到地上,那个瞬间,我亲眼看到他那种无奈的、苍白的脸。后来他被遣送到外地和老家,死后的骨灰盒只有号码,没有名字。共产党有三个书生总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张闻天也从事过文学创作与翻译,在遵义会议上的立场有目共鉴,可是从事社会科学的“科学工作者”却如此践踏人与践踏历史,真是匪夷所思。(4)外国文学研

究所的十几个“牛鬼蛇神”被几位造反派分子看押着，列队在大院里戴高帽“游行”，有个造反派手里竟拿着一根藤条，不断地抽打着这些“反动权威”，就像赶着牛群羊群一样。

(5)文学所有位研究员，他在批斗徐懋庸夫人王玮大姐时，为了表示自己坚决站在鲁迅一边，竟然给王玮大姐狠狠一巴掌。因太用力，他自己险些跌倒。

“文化大革命”中，社科院的荒唐事太多，三天也讲不完。我在“文革”时态度很消极，有点零钱就收集各院校的红卫兵小报，“文革”结束时，我装订了五六种完整的小报，例如《新北大》《讨瞿战报》，一张也不少。我写过大字报，但没有伤害过人，所以“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新建设》（那时已改为《思想战线》）的党支部，认为我在“文革”中的表现很好，就发展我入党（1979年转正）。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是演过《南征北战》中那个老妈妈的李大姐，很和蔼，她对党员们说：“让刘再复这种有才气又有傻气的人入党，对我们党有利。”

吴小攀：1978年之前，在“闹革命”的大环境下，一点都没有学术研究的空间？您自己除了写大字报、批判、旁观，有没有做一些如读书、写作、研究的工作？

刘再复：那时只可以读鲁迅与《红楼梦》，我把这两种书读得很熟。马列的书也读得不少，尤其是《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军宣队规定的六本书，我读得更熟。

吴小攀：谈谈和李泽厚的交往。

刘再复：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已故的樊挺岳老师就非常钦佩李泽厚，他让我读李泽厚和朱光潜先生的论争文章，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李泽厚的名字和他的“美感二重性”等美学理念，也心向往之。没想到，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和李泽厚在同一座楼里办公。我所在的《新建设》编辑部在院内（北京建国门外5号）主楼的第一层，李泽厚所在的哲学所在第二层、第三层。郭沫若的办公室也在第二层。

《新建设》编辑部很重视发表美学文章，而美学不由哲学编辑组管，由我所在的文学组管。1963年秋天，我刚到编辑部不久，有一个人送来稿子，交给赵幻云（文学组老编辑）后说了几句话就走。赵告诉我：“他就是李泽厚。”我当时有点惊喜，立即追到走廊里看他慢慢走上楼。后来“文化大革命”发生，《新建设》停刊，便很少见到他，虽然一起到河南干校，但也没有交往。倒是从干校回来后，胡乔木让胡绳、林修德以《新建设》的旧

班子为基础筹办与《红旗》对峙的新刊物《思想战线》，我才开始与李泽厚交往。

在一次筹备领导小组会上，胡绳看了我初步拟定的约稿名单后说：“能不能请院里的一流学者写稿？”我说名单上已有冯至、任继愈、唐弢等，还该请谁？林修德也请教胡绳：“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胡绳就说，例如钱锺书、何其芳、李泽厚嘛！经胡绳一说，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可以去找他们。于是，我就找到何其芳，约请他写一篇关于《水浒传》评价的文章，那时毛泽东刚批了《水浒传》不久（说《水浒传》“好就好在投降”），刊物需要参与。何其芳答应得很痛快，而且很快就写成了。

我也找了李泽厚，在大院一号楼办公室的过道上给他透露了胡绳的话。这之后，我们便开始交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交往更密切，我还跑到他家里聊天。1980年我写完《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请他作序。他也欣然应允。他说：“你这书下了功夫了。这是我第一次作序，别给你带来麻烦。”这之后，我更是常向他请教。当了研究所所长后，我还让司机开车载我到他的新家。那时已是很好的朋友了。

不过，李泽厚大我11岁，学术上更属前辈，我称他为“泽厚兄”，心里始终把他当作老师，和他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我一直认为他是我国现当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其美学既有原创性又有体系性。我在芝加哥大学“客座”期间（1989—1991），开过“李泽厚和中国现代美的历程”的讲座，说他创造了许多独特的美学命题。他的《美的历程》与《华夏美学》，是他的中国美学研究的外篇与内篇。前者讲述中国审美趣味变化的历史，前无古人。后者讲述中国的美学精神，是儒、道、禅诸家美学精神最为深刻的概述。李泽厚的三部思想史，用现代学术视角和学术语言概述中国哲学历程，每一章节都发前人所未发，很了不起。出国之后，他深化自己的研究，提出“巫史传统”“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情本体”“一个世界文化”和历史本体论等重要理念，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他的这些成果及其重大学术价值，可能得几十年后才会被世界所认识。我是“近水楼台”，可以最早知道他的新成果，阅读中的难点又可以随时向他请教，经十几年的积累，我不仅熟知他的美学，也领悟到他的一些哲学要领（尤其是他的伦理学）。20年前，我受其康德研究成果的影响，写出《论文学的主体性》，出国后我和他不断展开学术对话，倾听他的直接讲述，收获极大。特别是在对中国与西方的哲学差异、文化差异的把握上，他更是给我根本上的启迪，尽管我在某些文化思路上和他还是不同。

李泽厚有时也开玩笑地说：“要不是你被我所牵制，恐怕早受洗当教徒了。”李泽厚是个很坚定的理性主义者，完全不能认同宗教。他的体系是“有”生“无”的体系，是确认

人乃是“历史存在”的体系(人不是上帝所创造)。他把康德的“认识如何可能”的总课题转换成“人类如何可能”的总课题,并认定唯有人类自身的历史实践才能实现其可能,唯物论表述得极为彻底。我则常在理性与神性中徘徊,在认识论范围内虽不确认上帝的存在,但情感上却宁肯相信上帝的存在,觉得承认有一种比人更高的眼睛与尺度存在,才能谦卑。因此,我把上帝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假设,其态度如同孔夫子:“祭神如神在。”有此假设,便有敬畏。有一次,信基督教的小女儿为我抄稿子,发现稿中“上帝是一种形而上的假设”的句子,气得要命,说:“你把上帝说成假设,不对,不给你抄了。”我正是徘徊在李泽厚(无神论)与小女儿(有神论)之间的人。有点靠近爱因斯坦的态度:上帝存在与否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需不需要有所敬畏。倘若需要,那就不妨假设他存在。康德的四大悖论之外,似乎还可增加一对悖论:“上帝是存在的,上帝又是不存在的。”从科学上说,上帝不存在,但从心学(情感、信仰)上说,上帝又是存在的。

吴小攀:据说钱锺书先生对您很欣赏?

刘再复:1988年郑朝宗老师最后一次到北京来,他说:“我要北上看‘一老一少’,老的就是钱锺书,少的就是刘再复。”而且他写信给钱先生,一再推荐我。钱先生对我非常好,写给我很多信。有一次,1988年,全国社会科学大评奖,1000多篇论文,文学里面大概选出两篇吧,一共22篇,一等奖的论文两篇,就有我的一篇,钱先生还特别写了一封信来祝贺我,然后特别用一个词来形容,说我的文章是“有目共赏”。很高的一个评价。

吴小攀:您当时是怎么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刘再复:参加全民性的政治运动,并不等于参与了政治。准确意义上的参与政治,应当进入政治权力框架,直接参与政治角逐。这些意识我现在比较清楚明朗。在1978年,我入党了,第二年才转正。

当时打倒了“四人帮”,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从未为国家发生一件像“打倒四人帮”这样的事而这么衷心地高兴,而且高兴得那么久。20世纪70年代最后的几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几年,我重新恢复了对共产党的信任与情感。而当时我又被派往《红旗》工作了一段时间,很受信赖。我所在的党支部书记李大姐和其他委员,又真诚地希望我入党,我对李大姐说:“我怕讨论入党申请时又要自我批判和让别人批判一顿。”李大姐安慰我说:“你可以从简,我会和其他党员打招呼的,放心,不过你总得自我批评一下。”



1992年，在德国海涅故居

我说不知道该检查什么。她说讲讲自由主义就行了。于是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就在这个时候，我进入文学所，就在所里的一次支部会上通过了（事前《思想战线》已写好审批材料）。第二年转正时，院党委按例要最后审定，就派党委书记邢方群找我谈话。邢方群原是《工人日报》总编辑，后调入《思想战线》，早就熟悉我。他为人极为和蔼可亲，问我：“再复同志，你再讲讲为什么要入党。怎么想就怎么说。”于是我说：“我入党是真的入党，不是想混入党的。因此，我入党后一定要忠实于党的初衷，为人民的利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邢方群听了之后，愣了一下，接着笑呵呵地说：“对，耀邦同志说过，我们要永远和人民在一起。”